

战争书写与桃花源想象

——罗伯特·白英与沈从文小说的比较分析

汪云霞 戴思钰

摘要 罗伯特·白英与沈从文之间有着深厚的跨文化交流关系。白英对沈从文小说的集中译介，助推其在中国范围内传播；而经由阅读与翻译沈从文，白英的中国题材小说创作受到一定的影响。白英的战争观与生命观同沈从文高度契合，两人“活着即神圣”与“硬朗结实的活下去”的生命态度具有内在一致性。白英同沈从文一样，尤为注重挖掘战争中日常生活的诗性色彩，表现普通士兵的心理创伤与孤独体验。白英与沈从文小说中所创造的空间意象“新加坡河/云寺堂”与“白河/茶峒”可谓异曲同工，体现出他们对道家文化的推崇及其对桃花源世界的审美建构。另外，二者所塑造的祖孙关系、爱情关系乃至开放式的结局模式也存在诸多相似。白英与沈从文之间的种种关联，彰显了中外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深层交流与互动，为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启示意义。

关键词 罗伯特·白英 沈从文 跨文化交流 战争书写 桃花源想象

作者汪云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戴思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5-0174-1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曾在中国生活，他于1941—1946年先后工作于英国驻华大使馆、复旦大学以及西南联合大学等。在西南联大执教时，白英结识了沈从文、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等一批中国作家学者，并与他们交往密切，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1940年代的战时环境中，白英希望通过文学与文化交流增进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他主持编译了四部中国文学作品选，还创作了一系列中国题材作品，包括日记、游记、人物传记以及诗歌、小说等。白英这些作品在英语世界得以广泛传播，多维度地向西方传递了战时中国及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对中西跨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基于中国生活经历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想象，白英创作了多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士兵及其他》（*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tories*, 1945），长篇小说《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 1942），《春天的激流》（*Torrents of Spring*, 1946），《北极熊咳嗽》（*The Bear Coughs at the North Pole*, 1947），《情人》（*The Lovers*, 1951），《北京的一间屋子》（*A House in Peking*, 1956）等。这些小说从清代乾隆盛世，到20世纪初中国革命，再到抗日战争时期，故事背景跨越几个世纪，生动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变化。作为一位英裔小说家，白英创作固然离不开西方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滋养，但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影响。阅读白英的中国日记可以发现，他不仅对老庄哲学、陶渊明诗歌以及《红楼梦》等中国古典资源多有推崇并深受其惠，而且对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等人所代表的新文学传统也欣赏备至，在艺术精神上颇为亲近契合。而在一众新文学作家中，白英小说创作与沈从文的渊源关系最为深厚。

白英与沈从文既是西南联大同事兼朋友、还是作者和译者关系，他们的跨文化交流关系从1940年代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白英1940年代编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选中，就包括沈从文小说选。一方面，白英通过对沈从文小说的创造性翻译，大力推动其走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另一方面，经由阅读与翻译沈从文，白英自己的创作也受其影响，小说在题材、风格、技巧上都表现出对沈从文的认同与吸纳。具体而言，白英的中篇小说《中国士兵》与沈从文《早上——一堆土一个兵》《过岭者》《会明》在战争书写上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其长篇小说《新加坡河》在精神旨趣上与《边城》亦多有契合。这两位中西作家创作之间的深层联系值得专门探究。

一、白英与沈从文的跨文化交流

白英1943年9月赴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主讲“现代英诗”“西洋小说”“英文散文及作文叁B”等课程，同时进行中国文学翻译和创作实践。^① 沈从文则执教于中文系，主讲“国文二（作文）”“中国小说”“各体文习作”“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实习”等课程。作为西南联大的同事，两人过从甚密，常一起探讨中外文学与小说创作技巧。

另外，白英与沈从文之间还存在亲戚关系。白英在重庆工作期间，有机会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相识相交。经由冯玉祥牵线，白英认识了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的女儿熊鼎，并与之恋爱和结婚，实现了他年少时迎娶中国公主的浪漫想象。而沈从文曾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任图书管理员。沈、熊均为湘西凤凰人，不仅如此，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熊希龄的小弟熊燕龄是沈从文姨父，而沈从文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1948年熊希龄逝世十周年之际，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纪念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满怀追忆之思。^② 或许由于妻子熊鼎为凤凰人之故，白英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并不陌生，甚至充满了亲切感。

更值得关注的是，白英还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英译者和传播者。早在白英奔赴中国之前，沈从文已有小说被翻译到英语世界。1935年，诗人邵洵美与美国作家项美丽合译《边城》，并在英文杂志《天下》月刊连载。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编译的中国小说选《活的中国》出版，其中收录沈从文《柏子》^③，斯诺将沈从文比作“中国的大仲马”。^④ 不同于斯诺等人1930年代的零星译介，白英1940年代对沈从文开始了较为系统的翻译，大大促进了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程。白英曾回忆从事中国文学翻译时的愉快心境：“我讲授莎士比亚的课程，修改学生的论文，完成了一部沈从文短篇小说选的翻译，着手整理诗集《小白驹》，我感觉生活在一个随时都会破碎的迷人梦境中。”^⑤ 1946年，白英与西南联大教授袁家骅合作编译了《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其中收录了沈从文的《灯》（*The Lamp*）与《黑夜》（*Under Cover of Darkness*）。不仅如此，白英还与联大同事金隄共同编译了《中国土地：沈从文小说选》（*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于194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中国土地》收录了十四篇小说，分别为：《柏子》（*Pai Tzu*）《灯》（*The Lamp*）《丈夫》（*The Husband*）《会明》（*The Yellow Chickens*）《三三》（*San-San*）《月下小景》（*Under Moonlight*）《媚子·豹金·与那羊》（*The White Kid*）《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Three Men and a Girl*）《龙朱》（*Lung Chu*）《夫妇》（*The Lovers*）《十四夜间》（*The Fourteen Moon*）《一个大王》（*Ta Wang*）《看虹录》（*The Rainbow*）《边城》（*The Frontier City*）。

《中国土地》以1936年5月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为基础编译而成。《从文小说习作选》是沈从文自选的“十年创作纪念集”，收录了其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的小说作品。这部选集收录的作品题材多样，涉及乡村社会、青年恋爱、军旅生活等方面，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白英在序言中如此评价道：“在《中国土地》中你会遇见真实的中国人。沈从文对此无所隐藏，揭示一切。奇怪的并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三卷·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9、342页。

② 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③④ Edgar Snow,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John Day and Reynal&Hitchcock, 1936, p. 182, p. 181.

⑤ Robert Payne, *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 1937—1946*,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72, p. 277.

不在于他创造的世界如此美丽，而在于他创造的世界竟如此完整。”^① 他对沈从文赞赏有加，认为其“写作大胆细腻，对生活的巨大深度与微妙的细节有巧妙的理解”^②。他甚至将沈从文的文学价值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已逝，他的影子仍笼罩在现世所有作家身上。但沈从文依然活着，通过他传递出了中国的另一种民族魂，更有活力也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搏更密切相关。”^③ 他还指出，沈从文“是第一个在文学界发现苗族部落的人，是第一个能准确简洁地描述中国士兵与中国农民的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④ 正是基于这种认可与推崇，白英不遗余力地促进沈从文小说的英译与传播。

《中国土地》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西方读者了解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重要窗口。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认为白英这个译本“无疑是最简洁的”，“最能让英语世界读者体会到《边城》是真正伟大的世界文学作品”^⑤。他甚至说：“在理想状态下，若能能让白英和他在乔治·艾伦 & 昂温出版有限公司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的编辑们起死回生，并由他们来担任我的《边城》译文的编辑和润色者，结果可能会好得多。”^⑥ 在夏志清的推动下，白英译本于 1982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沈从文表达了再版时的喜悦：“我对扩大中美文化合作满怀期待……看到英语世界的读者对我多年前写下的故事很感兴趣让我非常高兴。”^⑦ 通过再版，白英译本在 1980 年代重新焕发活力，它促进了沈从文在当代的世界传播，也是白英与沈从文跨越近半个世纪友谊的见证。

白英对沈从文的集中译介使其对中国现代小说有了更深的了解，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自身中国题材小说的创作。白英译介具有三个方面的特色：其一，白英注重还原与传递沈从文小说的田园牧歌风格。作为一位热爱中国山水田园的诗人小说家，白英译文充盈着强烈的诗性色彩，往往能抓住沈从文小说中对于自然灵韵的描写与表达。其二，重视原作中日常生活意象的营造与凸显。如翻译《会明》时，其小说标题并未采取直译“会明”名字的方式，而是将之意译为寄托了美好情感的“黄鸡” (The Yellow Chickens)。小说中“黄鸡”不仅象征着在战争与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日常生活，更暗喻着新生与希望。这种创新译法不但有利于西方读者的阅读接受，而且更准确地把握了原作的精神内核，突出了士兵在残酷的战时语境中对平凡日常生活的深切眷念。其三，注重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达。在《边城》的翻译中，小说女主人公“翠翠”被译为“Green Jade”。“翠翠”既得名于茶峒满目青翠的山水之色，又可理解为一种浑然天成的珍珠翡翠之色，象征着精神品格上的单纯和美好。而“Jade”与中国传统玉文化紧密关联，有“精光内敛，温润如玉”之意，符合翠翠的形象和气质。较之戴乃迭译本的“Emerald” (绿宝石)、金介甫译本的纯音译“Cuicui”，白英译本的“Green Jade”既保留了“翠翠”的姓名意义，又很好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精神。有趣的是，白英在小说《新加坡河》中就运用了“Green Jade”这个名字。白英译本的这些翻译技巧和策略，体现出他对沈从文小说的创造性诠释和表达。而这种创造性诠释和表达，又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在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经由文学翻译与创作，白英与沈从文这两位中西作家建构了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关系。

二、战争书写：“活着即神圣”与“硬朗结实的活下去”

战争是白英中国书写的核心关键词。二战期间，他不仅撰写了两卷本战时日记《永恒的中国》与《觉醒的中国》，还创作了《中国士兵》《春天的激流》《北极熊咳嗽》等战争与革命题材的小说。其中，中篇小说《中国士兵》为白英亲历长沙会战后所作。白英曾作为《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报道长沙会战。他于 1941 年 12 月抵达重庆，数日后接到命令，以战争观察者的身份奔赴长沙。^⑧ 1942 年 1 月 6 日，白英赶到长沙时，日军已被击退，战争取得了暂时性胜利。他在日记《永恒的中国》中记录下了长沙会战结束后的情景：“在这里，战争赤裸裸地展现出它所有的暴力，房子里仍然遗留着尸体，在寂静的冬日早晨，镐的声音发出阵阵回声。这里出奇地安静。白羽喜鹊在树枝上歌唱，士兵们的脚步声在石墙上发出回声。”^⑨ 白英在战争现场的观

①②③④⑦ Robert Payne,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8, p. 7, p. 8, p. 12, p. 5.

⑤⑥ 张蓓：《沈从文小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汉学家、翻译家金介甫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⑧ Robert Payne, *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 1937—1946*,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72, p. 192.

⑨ Robert Payne, *Forever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5, p. 51.

察与体验直接激发了他创作《中国士兵》，小说于1943年10月23日完稿，1945年出版。作品以长沙会战为背景，描绘了士兵冯建田所遭遇的战时创伤体验，展现出普通人在战争面前的恐惧与勇气，传达出主人公真切复杂的心理感受。白英这部小说与沈从文的《早上——一堆土一个兵》《过岭者》《会明》有着高度的关联，显示出沈从文小说影响的痕迹。沈从文这几个作品主要创作于1930年代，它们以中国革命与战争为背景，注重对士兵个体情感的深入挖掘和细腻表达。具体而言，白英与沈从文在战争书写上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白英的战争观与生命观同沈从文的高度契合，白英所表达的“活着即神圣”的价值判断与沈从文“硬朗结实的活下去”的生命态度具有内在一致性。身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白英，对于如何理解战争或说如何言说一场战争陷入了艰难的思考。最终他放弃了对战争的宏大叙事而选择从个体士兵的角度去观察和反思战争。《中国士兵》中的主人公冯建田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但通过对其在长沙战役之前、之中、之后不同处境时深层心理和意识流的挖掘，白英赋予了他丰富善感的灵魂和孤独失语的精神状态。当冯建田在战场遭遇重伤时，刘上校为他作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关于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的，而你依然活着。我现在知道我们必须为生者作战，我们必须为年轻人、为爱人作战。”^①刘上校在战争中不幸逝世，冯建田则成为幸存者。经历战争残酷体验的他，几乎丧失了回忆和叙述战争的能力，长久处于失语和缄默状态。而他唯一记得的就是刘上校临死前对他所说的：“活着即神圣”（Everything that lives is holy）。这句遗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在不断重复这句话中，他逐渐唤醒了自我意识并恢复了对于战争的相关记忆。当四个月后被总司令召见和询问时，他脱口而出道：“刘上校说‘活着即神圣’。”^②作为白英小说核心观念的“活着即神圣”语出诗人威廉·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强调应该反对权威对“神圣”的垄断，主张回到每一个体的内在神性^③。换言之，真正的神圣不在庙堂之内，而在每一个具体、脆弱却顽强的生命本身。白英小说借此表达了对战争意义的思考和对生命价值的问询。在他看来，战争的意义并非鼓励崇高的死亡，而是要保障千千万万个体的生命有权利继续活下去。因此，小说中目睹了战友死亡的小兵选择坚韧地活下去，不是作为英雄，而是作为一个仍会感受饥饿、恐惧、爱与痛的具身性存在。遭受战争重创的冯建田，也最终选择替刘上校、替无数倒下的战友活下去。小说结尾，冯建田与妻子元英漫步田间，在墓前相拥而卧，宣告了爱与生的坚韧最终战胜了死亡的阴影。

白英小说“活着即神圣”的话语虽援引自布莱克，但他所表达的对于战争意义的思考却与沈从文小说如出一辙。沈从文关于战争、关于中国士兵的书写也传递出同样的对于死之悲凉、生之珍贵的喟叹。《早上，一堆土一个兵》中，沈从文以近乎残酷的简洁展现死亡的无意义：年轻士兵的阵亡被简化为“一堆土”的冰冷意象，鲜活的生命在战场中沦为不可计量的消耗品。《过岭者》中，年轻的士兵在几声枪响后无声地死去，困守土窟内的传令兵捡起了被踢到草丛里的红薯。小说借传令兵之口感叹：“倒下的，完事了，听他腐烂得了，活着的，好歹总还得硬朗结实的活下去。”^④沈从文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悖论：“生死虽说是大事，同时也就可以说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瘪了，烂了，便完事了。”^⑤正是在战争的暴虐无常中，沈从文“赋予阴鸷或佻俗的现象以抒情的悲悯，并试图从人间的暴虐或愚行中重觅生命的肯定”。^⑥他笔下那些坚韧地活着的士兵并非英雄主义的化身，而是在战争与死亡的阴影下，以最朴素的生存意志守护生命本身不可剥夺的神圣价值。白英在长沙战场的所见所闻所感，使其对沈从文小说中“硬朗结实的活下去”的生命观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并将这一观念与思考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形成了他“活着即神圣”的战时生命书写。

其次，白英同沈从文一样，注重在战争书写中发掘日常生活的诗性意义。在“活着即神圣”与“硬朗结

①② Robert Payne, *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Heinemann, 1945, p. 29, p. 51.

③ Alexis Lundblom, "For every thing that lives is Holy": Authenticity and Inclusion in William Blake's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Lund University, 2018.

④ 沈从文：《过岭者》，《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248页。

⑤ 沈从文：《三十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98页。

⑥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

实的活下去”的观念支配下，两位作家在描写中国士兵和战时生活时，都试图打破有关战争的宏大叙事，而重新发现和肯定日常生活之于个体生命的真实意义。沈从文小说《会明》中，伙夫会明对日常生活的关心远超战争本身，他冲向前线，“不为国家迁都或党的统一”，只为“冲上前去就可以发三个月的津贴”，他盼望战争快点结束，只是为了逃避盛夏尸骸腐化的生理性恐惧。他唯一期盼的是在边境的树林中，将军旗插到堡上。但小鸡破壳而出的那一刻，会明就将这个愿望抛到了脑后：“小鸡从薄薄的蛋壳里出到日光下，一身嫩黄乳白的茸毛，啾啾的叫喊，把会明欢喜到快成疯子。”母鸡孵出小鸡的过程，象征会明从“战争符号”向“生命守护者”的蜕变。“他为一种新的兴味所牵引，把战事的一切完全忘却了。”^①对会明而言，所谓“新的兴味”不单指养鸡，“更是一种对于日常生活本身的沉迷。这样的沉迷对他来说是崭新的，崭新到足够让他新生，……在日常生活的引领之下，会明完成了从一棵树朝向一个人的神奇飞跃”。^②沈从文注重从战争的阴霾中发掘日常生活的诗性之光，一只小鸡雏唤醒普通士兵的生命意识和“新的兴味”，恰是“活着即神圣”或说“硬朗结实的活下去”观念的具象化呈现。

白英《中国士兵》同样重视捕捉和挖掘在战争这样严酷的历史语境中日常生活的诗性价值。士兵冯建田原为普通农民，其名字“建田”象征着对田地的深厚情感。在行伍的五年间，他虽从未收到家人来信，但依然经常写信给母亲诉说爱与思念。这种情感的维系，不仅是对土地的牵挂，更是对生活方式的坚持和对亲情的守护。即使在残酷的战场上，冯建田竟然也思绪万千，被日常生活的各种影像缠绕。在中弹昏迷前的一刹那，他脑海中浮现的是未婚妻元英和故乡土地的影子。这种对土地的眷恋被白英视为中国士兵的精神底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国士兵的心。他们是农民的儿子，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中国土地的盐分；就像盐一样，他们能为中国的伤口清理消毒……在战斗中，这些士兵会停下来，望着旁边栽种着紫杉的荒废麦田叹息‘天哪，他们为什么还不耕种？’”^③通过对母亲、爱人、故乡、土地的诗性回忆与想象，白英赋予了战争书写以日常生活的情感和温度，凸显了“活着即神圣”的生命价值观。

历经战争创伤的中国士兵，若要真正享有日常生活的诗性之光却是异常艰难的，白英小说揭示了这种艰难性。当冯建田离开战场回到家乡时，他并不能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不断陷入对战争“非意愿记忆”的恐惧之中。普鲁斯特提出“意愿记忆”与“非意愿记忆”这对概念，“非意愿记忆”属于潜意识、非理性的层面，却更接近内在真实。“比如在一种气息带来的感受中，过去的时光浮现在人的面前。”^④在婚礼中的冯建田，咬了一口杏仁糖，随即听到了口腔中发出轻微的糖果碎裂的声音，这个轻微的声音瞬间开启了他的“非意愿记忆”。他发现自己居然手持冲锋枪站在战场中，“他在梦境中迷失了自己”^⑤。在战场上时，冯建田常陷入对未婚妻的“非意愿记忆”之中，然而当爱人就在眼前时，他却又陷入战争的“非意愿记忆”。虽然婚礼上的致辞让他回过神来，但旋即，他又再次陷入虚幻之中，战场上厮杀的记忆冲破现实击垮了他的心理。他开始怀疑“一切的一切，无一例外的都是从梦里冒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梦”^⑥。如果说沈从文以诗性的眼睛捕捉到中国士兵发现日常生活“新的兴味”的惊喜，即从正向上凸显了“硬朗结实的活下去”的要义，那么，白英小说则深刻地揭示了遭遇战争创伤的中国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而是从反向上强化了“活着即神圣”的价值观，白英与沈从文可谓是相反相成，殊途同归。

再次，白英与沈从文都擅长表现普通士兵的心理创伤与孤独体验。白英与沈从文在书写战争时，一方面注重对日常生活诗性意义的展示，另一方面则注重由外及内，从战时的外在环境进入到内在心理环境，揭示士兵所感受到的极致恐慌和深层孤独。由此表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外在的巨大破坏，更是内在的精神恫吓和创伤。白英的《中国士兵》与沈从文的《早上——一堆土一个兵》均描写了士兵个体在战争高压下的孤独感与精神濒临崩溃的疯狂状态。沈从文小说开篇写道：“天欲发白。一切静悄悄的。这份沉静便孕育了

① 沈从文：《会明》，《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92页。

② 翟业军：《一棵树如何成长为“一个人”——从〈会明〉看沈从文的人性》，《群言》2018年第5期。

③ Robert Payne, *Forever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5, p. 553.

④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33页。

⑤⑥ Robert Payne, *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Heinemann, 1945, p. 56, p. 57.

稍后一时金铁齐鸣的种子。”^①环境的肃杀冷寂衬托了留守士兵的孤独感受，而这种极致的“沉静”与随后爆发的激烈战斗形成强烈反差。在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老兵想象投掷手榴弹后，日军扭曲的尸体：“那大腿，那手指，那点撕碎拉长的内脏，起花的肠子，水蛇似的肠子”。在漫长的等待中，老兵陷入精神的疯狂：“在那时节老同志是半疯的。空中的一切声音皆使他发疯。”^②在老兵的想象中，战场上的死亡被具象化、碎片化和器官化。沈从文着重表达了士兵对战争的震惊体验和死亡恐惧。

白英《中国士兵》同样运用情境建构来烘托士兵内在的孤独体验。“尽管枪声响起，尽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尽管有尘土飞扬的爆炸，尽管有机枪突然迸发的紫色火光，夜晚却是死一般寂静。月亮照在白色的坟茔上，照在灰色的树上，照在青铜头盔上。”^③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是士兵孤独紧张心境的写照，身处战场的士兵陷入对日军轰炸的恐惧。冯建田用“非常孤独”来形容战斗时的体验，认为自己“恍若身处海之深处或大地底端，在这种孤独中，你的周围甚至没有任何坚硬的物体”^④。冯建田虽身处战场，意识却不断游移，他将手榴弹的下落想象成“黑色的罂粟花瓣从树上飘落”^⑤，战争创伤剥夺了他正常感知的能力，他在无意识的笑声中滑向精神的疯狂境地。

白英还通过描写中国士兵“在场的沉默”来揭示其遭遇的精神创伤。冯建田明明是长沙会战的参与者和在场者，然而，当他被要求回忆这场战斗时，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陷入失语状态。“他想说，你有种奇特的感觉，感觉到事物的成长非常生动迅速，你感觉到步枪的木质枪托像铁一样坚硬，子弹像树叶一样稀薄，无论你看向哪里，人们都摆出莫名其妙的姿态，一切都过得那么快，那么生动，以至于眼睛没有时间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但他找不到任何话来解释这些事情，而是保持着沉默。”^⑥他丧失了将复杂感官体验转化为连贯叙述的能力。在需要解释或言说的关头，他始终保持着沉默。这种“在场的沉默”，既是中国士兵遭遇创伤后语言系统崩溃的体现，也是他试图通过疏离战争记忆来抵御心理恐惧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白英小说对士兵沉默与失语状态的深入刻画，使沉默本身发出了尖锐的呐喊，促使人们反思战争给普通士兵造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伤痛。

白英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国友人对于战争孤独感的表达：“我们战斗……是因为难以言说的孤独，因为我们已一无所有。因为如果我们不发出声响，去狂奔，去呐喊，去厮杀，我们将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⑦白英创作《中国士兵》之时，已与沈从文是西南联大同事。在此期间，他一边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一边从事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国士兵》的创作灵感和写作资源，不仅可以归结为白英自身的中国经历，即他在长沙战役历史现场的个人观察与体验，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归结为沈从文小说影响的结果。白英所谓“活着即神圣”的战争书写正是对沈从文“硬朗结实的活下去”的有力呼应与创造性表达。白英《中国士兵》与沈从文《早上——一堆土一个兵》《过岭者》《会明》构成了具有互文性意义的小说文本，它们共同呈现了世界文学中关于战争书写的可能路径与方式。

三、桃花源想象：“云寺堂”与“茶峒”

白英的中国题材小说创作，始于194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加坡河》。它以新加坡中国移民为素材，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沧桑变化过程中一个中国家庭所历经的生活变迁。20世纪初，张家几代人从内地湖南经由绍兴、广州多地抵达新加坡，并开始了新的生活。老一辈人在新加坡复制并建造了中国家宅，通过讲述中国历史和文化回忆遥远的家国；年轻一代既接受了祖父辈教导的书法艺术和古典文学，又逐渐融入新加坡文化，通过异族通婚组建新的家庭。白英于1939至1941年在新加坡海军基地服役，其间频繁出入中文书店与图书馆，在华人朋友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并广泛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而言，新加坡这座岛屿，这座城市以及海军基地都是最纯粹的赐福之地，因为整个东方都在此汇聚”^⑧；“到处都是中国人，几

①② 沈从文：《早上——一堆土一个兵》，《沈从文全集》第7卷，第388页。

③④⑤⑥ Robert Payne, *The Chinese Soldier and Other Stories*, London: Heinemann, 1945, p. 13, p. 9, p. 13, p. 9.

⑦ Robert Payne, *China Awake*,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7, p. 50.

⑧ Robert Payne, *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 1937—1946*,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72, p. 117.

乎全都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神情中带着一种恬静的满足感”^①。除了日常研读中文著作外，白英“整天在海军基地和新加坡街头闲逛，写小说”^②。1941年1月至7月，白英创作了《新加坡河》。同年12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白英从新加坡奔赴中国，开启了中国生活之旅。《新加坡河》的空间背景为新加坡，但主要人物却是中国人，“新加坡河”其实是文化中国的延展与象征，寄托了白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审美想象。将《新加坡河》与沈从文《边城》比较阅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诸多相契合之处。

第一，白英与沈从文小说都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推崇与对桃花源世界的诗性想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与白英的“新加坡河”均包含着鲜明的道家文化色彩。道家重视自然无为，探索个体在顺应天道中实现精神自由的路径。沈从文认同道家文化，坚持让道家文化同西方现代文化与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交流、碰撞与对话，在现代社会重现自身的活力。^③ 诚如夏志清所言：“（沈从文）认为人类若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动物一样的原始纯良天性不可。他觉得，一个人即使没有高度的智慧与感受能力，照样可以求得天生的快乐和不自觉地得来的智慧。这种看法，当然是道家的和罗曼蒂克的想法。”^④ 在道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沈从文对“湘西世界”进行了桃花源式的理想化描绘，塑造了一个远离尘嚣、和谐宁静的精神乌托邦。

白英在日记中指出：“沈从文更愿意把湘西作为童年回忆去记录，害怕成年后审视湘西时那些神奇的光辉消失不见。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理由害怕：你现在还是可以看见他们在这里，从山上骑马而下，优雅地漫步，穿过整座城市，明晰地知道自己的生活充满传奇。”^⑤ 沈从文对湘西“神奇的光辉”的珍视与守护，及其对湘西生活传奇性的体认，既呼应了道家思想中对原始纯真、自然天成的推崇，也构成了其桃花源想象的情感内核，即对一种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合乎天道的理想生存状态的向往。因此，王德威以“想象的乡愁”（imaginary nostalgia）解读沈从文的小说，认为“他的乡愁，与其说是原原本本的回溯过去，更不如说是在以现在为着眼点创造、想象过去”^⑥。这种创造与想象，正是沈从文在道家精神指引下，对现实湘西进行桃花源想象与建构的过程。

白英同样高度认可道家哲学观念，并通过翻译实践深度走进道家文化。他在《小白驹：中国古今诗选》中专门选译《道德经》，还强调它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义：“事物如不归本源，就不会有诗歌存在。《道德经》收录的片段包含了《诗经》中缺失的主题……这里有陶渊明《桃花源记》这样的散文诗主题，也包含李白诗歌的主题。”^⑦ 白英崇尚老子的哲学思想，他指出：“老子是充满好奇且非常通透的中国人，厌恶战争，喜欢简单的事物，用一切努力与自然和解，而非尝试统治自然。人类不应与自然作战，他必须顺应道。”^⑧ 另外，白英在《小白驹》中还选译了陶渊明诗作20多首，除《咏贫士》《饮酒》《归园田居》等诗作之外，还包括《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两篇散文，白英也将其归入诗歌之列。白英对陶渊明评价颇高，将其与西方诗人维吉尔、弗罗斯特、叶芝等相提并论，称赞他是“诗人中的诗人”“一位最早亲切描述自然的中国诗人”。^⑨ 白英表示，自己之所以选译《桃花源记》，是因为“它纯粹的美”，更是因为“它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在那些最优秀的汉代诗作中屡屡出现的、在《道德经》中隐约可见的‘复归’的意象，在此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⑩

白英在《新加坡河》中也建构了一个具有道家文化色彩的桃花源世界。故事起始于1909年的中国湖南刘庄艾林村。彼时土匪混战，村民日夜受其侵扰，皇室却强行干预，勒令村民不得抵抗。张家人深受道家哲学影响，主张无为而治，因不满战乱中政府的高压管理而举家搬迁至新加坡。就像沈从文《边城》中白河一样，新加坡河也具有自然恒常的诗性：“在新加坡没有人按照历法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农民辛勤耕耘来种大

①② Robert Payne, *Eyewitness: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Tumultuous decade 1937—1946*,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72, p. 118, p. 119.

③ 吴道毅：《道家文化的现代意义——论沈从文对道家文化的传承》，《江汉论坛》2019年第8期。

④ 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⑤ Robert Payne, *China Awake*,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47, p. 142.

⑥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271页。

⑦⑧⑨⑩ Robert Payne, *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7, p. 67, pp. 67-68, p. 129, p. 132.

米和玉米。四季如常，每日如常——永恒的夏日混杂着秋日的风暴”^①，“对在新加坡的华人而言，没有季节的变化，树木和花朵都根据既定的规律生长凋亡，时间稳定而缓慢地移动着，就像那闲云堂前的河水一样”。^② 张家在新加坡河畔找到了一个新的桃花源世界，他们遵循道家无为而为的理念，过着简朴宁静的生活。这种“复归于朴”“知足常乐”的理想生活图景，正如同陶渊明所构建的桃花源世界，也恰似沈从文所着力营造的湘西世界。

第二，营造桃花源想象的客观对应物“云寺堂”与“茶峒”。白英在《新加坡河》中建构了一个具有诗性色彩的空间意象“云寺堂”，它与沈从文《边城》中的“茶峒”相互呼应。在两部小说中，“新加坡河/云寺堂”与“白河/茶峒”，它们既是故事发生的具体空间场景，也是具有道家文化象征色彩的核心意象符号，凝聚着两位作家的审美想象与文化理想。“沈从文的湘西是现代性视阈下的桃花源，与陶渊明的诗篇有异曲同工之妙。”^③ 茶峒位于两省接壤处，因特殊地理位置而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其居民仿佛置身于历史洪流之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④。此种高度自足的生活形态与历史疏离感使茶峒呈现梦幻与现实交织的状态。“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⑤。《边城》中桃花、人家、酒肆共同形成了一个诗性化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边城》中的“茶峒”是湘西人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诗性存在，那么《新加坡河》中的“云寺堂”则经历了张家人主动“寻求—发现—建构”的过程。张家为躲避刘庄战乱远赴南洋，在新加坡河畔定居，这一情节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避秦时乱”似乎遥相呼应。白英似乎有意将“新加坡河”想象为古典桃花源的现代变体。张家人居住于因地理隔绝形成的稳定社区，沿袭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然而对祖父而言，这种文化漂泊之地终难消解乡愁，故乡成为其永恒的情感牵挂。祖父先是寄希望于打造微缩版的刘庄：“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在安梅的卧室窗外建造了一件刘庄的完美复制品。他们用红土打造了专门养鸭子的池塘、种满粮食的田地、寺庙，沿着山脉蜿蜒而上的轿子。”^⑥ 在模仿与复刻中，祖父完成了寻找文化记忆的诗意化工程。然而，人工打造的复制品并不具备真正的救赎功能，祖父转而追寻能够真正让灵魂寄托的“桃花源”。其寻找和发现理想之地的过程仿佛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传奇：祖孙一行驾船出行，忽遇河道变窄，小船竟神奇地驶入狭窄的河道，传闻在此附近曾有村落，但此后被丛林淹没。当少女梅芙在嬉水玩闹时，却意外发现一条小径：“让她惊讶的是，这里没有沙子——只有红树林和茂密的草丛，还有一条小径穿过橡胶树和木麻黄树。这条小径让她迷惑不解。她不明白人们为何要大费力气在此地开辟道路。因为据她所知，除了半英里外的那座红房子，此地杳无人烟。”^⑦ 在这片远离尘嚣的土地上，张家人感到心灵的安宁，决意在此建造栖居之所：“我们就待在这里，自己种粮，远离尘世。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厌倦了城市生活，就可以来此栖居。”^⑧ 他们清理红树林、打造地基、开辟菜园、引河改道，历时两年落成的云寺堂，最终成为张家人的桃花源：“在云寺堂我们能找到真正的宁静。”^⑨

耐人寻味的是，两部小说都塑造了祖孙人物关系，而其中的祖父都是桃花源世界的守护者。《边城》中的祖父可视为“白河/茶峒”的化身，他五十年如一日守着茶峒的渡船，似乎“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⑩ 而已，他的生命似乎与白河融合在了一起。《新加坡河》中的祖父则作为“新加坡河/云寺堂”的精神象征。云寺堂于他而言，是精神的栖居地，也是通向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神圣空间。在此，他教导孙辈学习书法、朗诵古诗、研读文学经典，试图唤醒他们的中华文化记忆。

沈从文以“茶峒”的挽歌，祭奠了一个正在逝去的、诗意的乡土中国，而白英通过“云寺堂”的建构，描绘了离散者在异域重构精神原乡的尝试，展现了中华文化在流动与交融中生生不息的韧性和创造力。

第三，爱情悲剧与失落的桃花源。两部小说中都发生过令人怦然心动的爱情，美好的爱情都诞生在桃花

①②⑥⑦⑧⑨ Robert Payne, *Singapore River*, London: Heinemann, 1942, p. 87, p. 241, p. 94, p. 174, p. 174, p. 176.

③ 袁玉梅：《跨文化视阈下看沈从文、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

④⑤⑩ 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73、67、63页。

源的诗性空间之中。而两部小说中的三角情感模式也都使爱情最终陷入悲剧结局。沈从文笔下是“一女两男”模式，即翠翠与天保、傩送两兄弟的情感纠葛；白英笔下则是“一男两女”模式，即张家少爷小迪与侍女安雅、商人之女田雪的情感纠葛。

《边城》中爱情的萌发纯净而美好，翠翠同时受到天保、傩送的追求。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但傩送宁愿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然而，“尽管小说中洋溢着纯任自然的韵律和抒情节奏，它却不能摆脱一种尖锐的意识——意识到误解、延宕、决绝的激情和毁灭无处不在的力量”。^①在《边城》桃花源式的纯真爱情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忧虑。贯穿小说始终的白河既是生命的纽带，也可能是死亡的预兆。河水的流动性暗示了桃花源无法真正封闭于现实时空之外，外部力量与自然风暴随时可能入侵。摆渡一生的祖父也无法保证将孙女渡到幸福的彼岸。最终，天保死了，傩送走了，白塔冲塌了，爷爷也死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使爱情走向宿命般的悲剧。小说的结局如同一曲未完的挽歌，翠翠独自守候在渡口，等待着或许永不再归的爱人。

在《新加坡河》中，张家少爷小迪在八岁时即陷入对十二岁侍女安雅的爱情，他们在云寺堂获得了爱情的巅峰体验，然而，这份爱情也像桃花源般虚幻易逝。较之于《边城》中为了翠翠而放弃磨坊的傩送不同，张迪屈从于祖父的命令，迎娶了商人之女田雪，他所爱的安雅只能以侍妾的身份陪伴在侧。张迪不满于妻子田雪的浮华生活，更对其每天跳舞打麻将空虚度日感到厌恶。在一次争执之后，妻子田雪离家出走。七年后，作为张家人栖息地的云寺堂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难以为继，在革命的炮声中被征用为海军基地，桃花源最终在现实中沦为幻影。

张迪也如傩送一般出走，他选择只身一人从新加坡回到中国，目睹了故乡湖南的宅院被日军占领，便立即投身于长沙会战。归家之后的田雪和安雅如同翠翠般陷入了无止境的等待，她们的爱人或许明天归来，或许永远不归。与此同时，在长沙战场上的张迪也陷入了深切的思念：“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和家人，他想起了他的爱妾，她带给他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快乐；他忽然停住了，看到了飘浮在他头顶上方的旗帜，就像即将燃爆的火焰一样。”^②张迪将继续投入抗战洪流，还是返回新加坡，开启“离去—归来—离去”的循环模式？《新加坡河》与《边城》一样，都创造了耐人寻味的开放式结局。两部小说“男/女”主人公也都呈现出“离去/等待”的相同命运。

不同的是，《新加坡河》中，张迪的出走有更多主动和积极选择的色彩。张迪儿时曾目睹伐木工人的贫困，了解到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并有机会与孙中山深入交流。虽然他身居世外桃源般的云寺堂，但内心始终有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实际上，小说中的爱情与革命形成了双线同构关系。当云寺堂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拆除时，祖孙两人主动选择了革命，祖父支持张迪返回湖南参加长沙会战。对于张家而言，虽然“云寺堂”的毁灭具有悲剧色彩，但某种意义上，这个桃花源的失落也预示着一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的开始。

结语

白英与沈从文这两位小说家，虽然他们各自所接受的文学与文化传统不同，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也不尽相同，但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却分享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相似的理解和表达。这或许与他们共同的战争经历有关。沈从文有着行伍生活经验，而白英来到中国之前曾在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基地服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到中国，并以战地记者身份亲历中国战场。两位作家都曾近距离地观察过战争，并亲身经历过战场上的血腥与残酷。两人也正是由于战争导火线而在 1940 年代的西南联大相遇。经由文学翻译，白英更深入地走进了沈从文的艺术世界。从译介沈从文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白英以跨文化写作者的身份表达了他对战时中国及中国人的深切理解和同情。白英与沈从文有关中国士兵题材的小说，共同丰富了世界文学中的战争书写。

沈从文的《边城》创作于中国革命与战争阴云密布的 1934 年，白英的《新加坡河》则创作于二战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保罗·福塞尔指出：“求助田园是一种英国模式，既可以充分衡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

①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 291 页。

② Robert Payne, *Singapore River*, London: Heinemann, 1942, p. 336.

难，又可以富有想象力地保护自己免除灾难。”^①“求助田园”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模式。中西两位作家在战争的大背景下，都不约而同地求助于田园模式，他们通过建构桃花源式的乌托邦想象，试图缓解战争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希望在诗性世界中寻求精神疗愈的可能。较之于沈从文《边城》中田园牧歌的纯粹与宁静，白英似乎奏响了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命运交响曲，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更强的时代精神和抗争意识。

白英与沈从文的跨文化交流，推动了沈从文小说的英译与传播，同时也促进了自身中国题材小说的写作。显然，白英的这些跨文化写作有助于传播中国声音和建构中国形象。白英小说与沈从文小说之间的联系性，揭示了文明互鉴与中外文学文化之间的深层交流互动关系，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左联’诗歌文献的抢救性整理与研究”(2025BWY0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

War Writing and Peach Blossom Spring Imagination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obert Payne's and Shen Congwen's Novels

WANG Yunxia, DAI Siyu

Abstract: Robert Payne and Shen Congwen shared a profound cross-cultural relationship. Payne's concentrated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Shen's fiction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d its global dissemination; Moreover, through his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of Shen, Payne's Chinese-themed fiction was influenced to a certain extent. Payne's views on war and life we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Shen's, as both demonstrated an intrinsic consistency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life, encapsulated in their respective notions of "Everything that lives is holy" and "To live on with toughness and resilience." Like Shen, Payne place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exploring the poetic dimensions of everyday life during wartime, portraying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solitary experiences of ordinary soldiers. The spatial imagery created in their novels—such as "Singapore River / Cloud Temple Hall" in Payne's works and "White River / Chadong" in Shen's—can be regarded as comparable achievements, reflecting their reverence for Daoist culture and their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a Peach Blossom Spring world. Moreover, their depictions of grandparent-grandchild relationships,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even open-ended narrative structures exhibit numerous similarities. The manifold connections between Payne and Shen illuminate the deep-leve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fering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Robert Payne, Shen Congwe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r writing, Peach Blossom Spring imagination

^①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55.